为赚零花钱主动“贩卖”身份信息

骗局翻新 大学生成卡贩眼中“香饽饽”

万 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吕宝洁 杜 艳

2019年12月11日，21岁的浙江杭州小伙子李明（化名）没想到自己会被叫到派出所，接受江苏无锡警方的问询。

早在1个月前，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公安机关接到当地市民报案，称自己接到诈骗电话，通过网银被骗走2000余万元。

经查，犯罪分子在境外实施犯罪，当事人资金被骗后流入多个来源成谜的境内银行账户内。而李明的银行卡账号正是其中之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解到，互联网的黑灰产江湖里已形成一条买卖银行卡“四件套”（一般是指银行卡、对应绑定的手机卡、身份证和U盾——记者注）的链条化、体系化犯罪“产业链”，而大学生群体位于产业链的最上游。

150元收一张银行储蓄卡

去年10月7日下午5点多，浙江某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李明无聊地在宿舍玩手机，顺便浏览一下兼职信息，准备赚一些生活费——他在国庆假期几乎花光了所有生活费。在学校的一个qq兼职群里，一名网友发布了兼职信息，让人看起来高薪又省事。这名网友招募大学生兼职办卡，150元收购新办的银行储蓄卡，每个人一天可以办3张卡。

办3张银行卡就可以换点钱用！一直沉迷网游的李明对此很动心。第二天一早，他就添加了这位网友的微信。他询问办卡的用途，对方解释“办卡是购物网站刷单用的，还有直播刷礼物等用途。

为了打消李明的疑虑，对方补充：“你如果怕出事，过了3个月可以去把银行卡注销，而且我们可以签租用协议。”

随后，李明看了对方发来的“租用银行账户协议”：甲方出售银行储蓄卡给乙方，3个月内甲方不能使用，也不能挂失、注销、补卡。乙方将支付甲方150元。

李明觉得协议没什么陷阱，就同意了办卡。随后两人约定时间、地点和联系方式。

第二天上午10点半，李明联系上一个叫“大牛”的男子。“大牛”让李明去移动营业厅办一张电话卡，新办的银行卡注册信息都要预留这个新的手机号码。

“大牛”询问李明没在哪些银行办过银行卡，随后，“大牛”就领他去了附近的邮政储蓄银行。当时，“大牛”没进银行，就在银行门口等着李明。进银行前，“大牛”特意叮嘱：“一定要开通网银和U盾，银行卡密码必须使用指定的数字。”

12点半左右，李明办好第一张银行卡。因为下午还有课，于是双方约定下次再办剩下的几张银行卡。随后，“大牛”拿出一张打印好的“租用银行账户协议。”让李明签字，双方都按了手印。

签完协议后，“大牛”说：“一张卡150元，再补贴10元交通费。”随后，大牛向李明索要身份证拍照，这让李明起了疑心。

“大牛”解释，这是为了验证身份。“具体为什么验证身份，我也没搞清楚。”李明说。当时他着急回校，就把拍照的身份证照片给了“大牛”。

①4月26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第一高中的学生们课后时间在学校的体育场练习踢足球。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渐趋稳定，河南省三门峡市辖区内各中、小学有序复课，校园里重新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学校的体育场上又看到了学生们灵动、活泼的身影。

②4月30日，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学生在课间练习花样跳绳。

③4月22日，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在学习骑独轮车。

人民视觉供图

回校前，李明把新办的邮政储蓄卡、U盾和电话卡都交给了“大牛”。

“大牛”还检查了李明的手机，确定李明的支付宝、微信及银行卡App没有捆绑新的银行卡后，才让他离开。

10月14日中午12点，李明再次电话联系了上次的网友，表示还可以再办两张银行卡。对方表示：现在银行卡涨到200元一张了。

这次，对方准备了一张联通手机卡，让新办的银行卡预留这个手机号码。随后，李明新办了绍兴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把储蓄卡、U盾交给了对方。与上次一样，双方也签了一份“租用银行账户协议”。这次，对方转来了410元，其中10元是交通费。

“四件套”背后的贩卡江湖

其实，李明只是其中一个被骗的大学生。无锡警方调查发现，“大牛”等人在河北、天津、浙江等地，找人代办银行卡等“四件套”。他们收购“四件套”的对象一般都是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收入的年轻人。

去年8月底，来自甘肃的小伙子王强（化名）在招临时工的微信兼职群里看到有位自称大神的人发布了收银行卡的广告，办好“四件套”的价格是450元。随后，他办理了两张银行卡，对方给了900元。

两个月后，王强在微信兼职群里再次看到有人发布广告，随后有人讨论：网络赌博之类的犯罪活动用这些银行卡走账洗钱。他上网检索资料后发现，“这些钱是不干净的”。通过一系列操作，王强把银行卡绑定在手机相关账户上。

让王强记忆深刻的是，去年11月20日晚上6点多，他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一下子发来很多信息，“接连几笔进账之后，就会有几笔出账”。最后总共进账35万元，每次进账5万元。随后，他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也有进账消息，3笔进账总共3万元。

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网上检索“四件套”联系到多位卖家。一名卖家开价2500元。

另一位卖家表示，“四件套”一套卖800元，包3个月，提供真实的身份证复印件。“保证3个月不挂失，寄之前我会重新查验，没有绑定第三方。3个月后，你要继续提供‘四件套’，还是800元3个月”。

今年1月19日，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对倒卖银行卡给境外犯罪分子的舒某、赵某辰、赵某伟正式批准逮捕。其中，“大牛”等人正是舒某专门找的代办银行卡的犯罪团伙。

据警方调查发现，银行卡的买卖呈现拉皮条的收购模式。银行卡“四件套”在收购时一般每套200元，但在过程中层层转卖，层层加价，最后到真正的买家手里最高可以卖到每套3000元。

贪图小利而出售银行卡存在法律风险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汪冒才检察官介绍，提交银行卡“四件套”的很多都是大学生。银行卡黑贩子往往通过兼职群打入学生内部，以轻松、高薪、兼职诱惑学生，每张卡支付150—200元不等的费用。有的大学生只是为了能多一些钱网购、消费或者上网吧打游戏，便草率地把身份证等信息交给骗子，甚至还有出现以宿舍为单位的群体性被骗现象。

为何大学生会成为银行卡黑贩子眼中的“香饽饽”？

汪冒才介绍，首先大学生无不良征信记录，所办理的银行卡也是干净的白卡，更有利于不明资金转账流水。其次大学生群体庞大，基数大，上当受骗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而且大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思想单纯，容易轻信他人。

“如今兼职诈骗手段不断更新，五花八门，归根到底都是利用受害人趋利避害和轻信麻痹的心理，诱使受害人上当而实施犯罪活动。”汪冒才提醒广大大学生群体，银行卡属于实名制，不是商品，非法买卖则会构成犯罪。“贪图小利而出售自己的银行卡，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导致个人信用、财产双重受损”。

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樊国民律师认为，根据2003年4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套取银行信用。“所以出租、出借银行账户，是典型的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对于非经营性的存款人有上述行为的，将会被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罚款”。

樊国民指出，按照规定，单位和个人存在出租、出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的行为，被公安机关认定属实的，银行机构将在5年内暂停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ATM等非柜面业务，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机构在也将在5年内暂停其支付账户所有业务。

另外，所有银行机构、支付机构也将在3年内不为其新开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此外，上述行为也将被记入个人征信报告，并可能涉嫌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另外，汪冒才还表示，银行卡不是闲置物，要妥善保管，对于废弃不用的银行卡，应及时注销，不得随意丢弃，更不能转让、出售。

汪冒才建议，大学生要克服“贪利”思想，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做兼职补贴生活费，应该去找正规平台，而不能总想着不劳而获。现在网络上出现的所谓招收办卡兼职，还有坐在电脑前手指动动就可“月入过万”的兼职工作基本可以认定为骗局。

风 评

北京义教新政能否为学区房降温

□ 樊未晨

近日，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北京市已于4月底发布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政策，之后各区县也纷纷发布了本区的入学政策，笔者经过梳理后发现，“六年一学位”“多校划片”等词语出现在多个区县的政策中，成为北京几个“幼升小”择校热门城区入学条件的标配。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这些措施将有效遏制高价学区房，给学区房降温。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先看政策。

从北京市东城区公布的政策中可以看到，该区自2019年起，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地址及适龄儿童就读学校实施记录，自该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6年内只提供一个单校划片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权证书为2018年6月30日后取得的家庭，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在东城区内多校划片安排入学。

在择校热门的西城区和海淀区的政策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规定。

西城区规定，自2020年起，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址及就读学校实施记录，自该房产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6年内只提供一个登记入学学位，6年内再有适龄儿童登记入学的，采取多校划片入学方式；2020年7月31日后新购房产家庭适龄子女小学入学时，全部采取多校划片入学方式；2020年7月31日后户籍从本市其他区迁入西城区的适龄儿童小学入学时，全部采取多校划片入学方式。

海淀区则规定，继续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址、就读学校实施记录，与2016年以来该地址入学信息进行比对，自该套住房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6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2019年1月1日后在海淀区新登记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实施多校划片。自2020年起，新建小学和中学新增设的小学部，原则上实施多校划片。

显然，北京的择校热门城区对于多校划片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那么，实施了多校划片后是否真能给学区房降温呢？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就近入学”政策，所谓单校划片就是，适龄儿童在入学时，其所在小区对应着某所学校，如果这所学校是名校，那么势必造成与该校对应的小区成为抢手资源，价格水涨船高，这就出现了热炒“学区房”的现象。甚至，在一些热门校附近，曾经出现过“天价过道房”“天价车库房”等情况，北京也在几年前出台了严格的审核举措：凡不符合实际居住条件的，均不得作为入学资格条件。那么实施了多校划片后，相近的几所学校对应相近的多个小区，并实施电脑随机派位，也就是原来的某小区不再固定对应某学校，学校与小区之间不再是固定的对应关系了。那么，原来意义上的学区房概念就弱化了。

其实早在2016年年初，教育部就在《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地方，要积极通过单校划片的方式，落实就近入学的要求。在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

北京市也在近几年的义教入学政策中强调，逐渐扩大多校划片的比例。笔者发现，其实不只是那些择校热门的城区，今年，一些远郊区县也对遏制择校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比如，石景山区在政策中提出2019年9月1日后，在石景山区内经二手房交易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用于申请入学时，将不再享受单校划片入学政策，实行学区内多校划片入学政策；大兴区提出将根据学位供给情况和户籍、房产、居住年限等因素，积极稳妥探索单校划片、多校划片相结合的入学方式，形成更加公平完善的就近入学规则。

当然，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家长盲目择校的冲动，还要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下功夫，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缩小校际之间的差距，真正实现受教育者在家门口就能选到心仪的好学校。

探 索

合肥市庐阳区：“真金白银”帮民办幼儿园渡难关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磊 王海涵 通讯员王凯）“疫情切断了我们民办园的收入来源，房租支出和工资发放加重了资金周转困难，教师队伍也变得不稳定。同时，防疫物资储备和设施搭建也是一笔开销。”近日，位于合肥庐阳区的美景人家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就在她愁眉不展之际，一则10万多元的租金减免政策消息，令她转忧为安。

“我们在接到市里‘疫情期间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相关主题文件后，随即将其中提到的减轻房租负担、加大信贷支持等内容，向辖区各民办园通报并指导他们进行申报。”据庐阳区教体局学社办负责人介绍，依照规定，美景人家幼儿园已享受到了3个月共计10.6万元的租金减免。同时，该园在完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身份认定后，还有可能申请到全年的房租减免。

同时，学社办正会同相关单位对美景人家幼儿园等民办幼儿园进行跟踪指导，同时加大对民办园个性需求的摸排，努力提升帮扶效果。

此次帮扶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享受的红利最明显。所谓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通过教育部门认定，面向大众、质量合格、接受财政经费补助或政府其他方式的扶持，且收费执行政府限价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该区目前已向辖区30所普惠性民办园提前拨付本年度春季普惠园奖补资金772.8万元，并帮助15所幼儿园落实政策，减免房租金额达68万元。

据介绍，该区还将民办幼儿园的注册资金从原来的60万元降至30万元。而针对部分提出贷款申请的民办园，该区正对接相关机构，尽量满足其合理金融需求。

连日来，庐阳区将民办幼儿园纳入疫情防控工作体系，统筹做好防疫物资的调配、供应工作。目前已采购储备5万只口罩、220余把额温枪、600余瓶消毒液、150顶帐篷等用于支持民办幼儿园及幼儿看护点工作，并为每所幼儿园隔离室配备了防护服及护目镜。

先 锋

1038天的坚守

——专访长征五号B首飞任务“01”指挥员胡旭东

李 帆 张 末 杨 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润文

2020年5月5日18时00分，我国又一新型号火箭长征五号B点火升空，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长征五号B首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在精确完成船箭分离那一刻，测试发射指挥大厅正中央，一名男子摘下眼镜，任由泪水流过脸颊。少了几分预想中成功后的狂欢，多了几分完成答卷的沉着。他就是本次“01”指挥员胡旭东。

胡旭东2003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现任文昌发射场发测站副站长。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胡旭东成绩优秀，表现突出。此前，胡旭东曾担任过北斗二号、风云二号、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飞任务“01”指挥员。

胡旭东上次担任“01”指挥员是2017年7月2日的长征五号遥二任务，火箭起飞后因发动机工作异常造成发射失利。1038天的等待，1038天的坚守，胡旭东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近3年的时间，他有没有想过放弃？为了长征五号B首飞，他做了哪些准备？任务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第一时间走近胡旭东。

胡旭东说，面对长征五号遥二的失利，他并没有气馁，长征五号B首飞的成功也不是一朝一夕。

长征五号遥二失利后，胡旭东组织进行原因分析、故障排查，既分析火箭的故障，也查找发射场的测试工作漏洞和地面设备隐患。

他表示，在近3年里，为了提高地面保障能力，提升设备可靠性和稳定性，发射场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和技术改造升级。

发射场应急油机建设就是胡旭东负责的一个项目，他解释说：“发射场电压波动，一年中会遇到很多次，轻微波动零点零几秒钟，严重的会造成大面积停电，比如2014年威马逊台风，在发射任务过程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应急油机投入使用后，可以保障发射场设备安全和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发射日当天遭受意外情况断电后也可以继续组织发射，保证发射窗口不错失。”

长征五号B火箭是长征五号火箭的一个拓展型，直观上只是少了芯二级。有人说做减法很简单，把芯二级相关的测试取消就可以了，到底难度在哪里？

“硬件、软件都有变化，用老的方法测试新的火箭，是要出问题的。”胡旭东说长征五号B测试最大的难点就是要提前梳理技术状态变化带来的测试操作调整。

仅就芯一级垂直总装而言，仪器舱从芯二级上方调整至芯一级上方，增加了长度一米多的吊装环框。相比长征五号，芯一级吊装难度成倍增加，而长征五号芯一级吊装本身就是一个大难题。胡旭东还打了一个比方：长征五号芯一级吊装好比提着接近满载的水桶从狭窄的楼梯上楼，不让停歇、不让磕碰还不能泼洒，长征五号B把水桶加满了。

火箭长度、操作可达性变化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发射场都需要进行预先研究，做好充分准备。

胡旭东说：“航天产品很贵重，质量要求非常高，一颗螺钉安装时施加力大小就可能影响任务成败。”

提及长征五号B首飞任务，胡旭东提到最多的一字是“难”。难在疫情影响，难在并行任务。

无论是长征五号前几次发射，全员在位时都避免不了加班加点。长征五号B首飞任务开始时正好和疫情暴发期重叠，同时发射场还有长征七号改首飞任务并行。因为疫情，不能返回发射场和被隔离的人数加起来达到数百人之多，文昌发射场是如何克服人员难关的？

胡旭东表示，最首要的是防疫工作，如果发射场发生疑似病例，所有的测试工作都可能按下暂停键。相比发射场工作人员，春节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试验队员是疫情防控难点。

他和站疫情防控小组一起，发挥联防联动优势，细致掌握外来试验队员20天的行踪轨迹、接触人员和健康状况，督促落实隔离制度，每天检查测试人员口罩佩戴、体温监测登记和测试厂房消毒杀菌情况。

为了任务顺利进行，岗位人员经常在两枚火箭之间来回跑，经常是前两个小时在执行长七改任务，后两个小时又去执行长征五号B任务。

胡旭东坦承，他最担心的是：岗位人员从一个型号火箭测试转换到另一个型号火箭测试时，人员状态没有及时转换，造成问题。

航天发射最讲究的是质量，无论人员多短缺，胡旭东始终要求“进度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安全”，他对各分系统提出要求：宁肯一天多加班4个小时，也绝不能因为人数少，让不会的或者非本岗位的人员去操作。”

同时，各系统充分利用隔离人员，在房间里进行操作规程修改、应急预案完善等工作。

长征五号B任务关键阶段，传来了中国航天连续失利的消息，胡旭东也感到很难过，但是他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难过。”虽然他不是两次失利的直接参与者，但是为了确保100%成功，在其他型号失利消息传来的第一时间，他就组织各系统把多媒体记录、测试数据记录翻出来再进行比对，排查问题、分析漏洞、查找隐患。

为了进一步提高航天发射质量，各系统组织了防三误问题大讨论、质量管理体系再学习等工作，把以前经常出现过的系统故障翻出来，重新进行梳理、对风险漏洞重新进行分析，排查有没有当时轻易放过的隐患。

胡旭东表示：“数据复查结果显示，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精准可靠的。经过质量复查整顿，文昌发射场没有被失利击垮，反而对长征五号B成功发射的信心更足了。”

看着大屏幕上“祝贺长征五号B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画面，胡旭东笑着说：“今晚给自己放假，回去至少睡7个小时。”说完后他就起身走向发射塔架，现场查看发射后撤收工作。